

在地視角下的文化地景保存

以菲律賓伊富高梯田為例

Cultural Landscape Conservation from the Local Perspectives

A Case Study on the Rice Terrace Conservation in Ifugao, Philippines

官大偉*

Da-Wei Kuan

Abstract

The registration of World Heritage has become a strategy for cultural landscape conserv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since the 1990s. This study explores how claims of protecting the common heritage belonging to all human beings is localized and practiced, taking Ifugao rice terraces (which was registered as World Heritage in 1995) in Philippines as an example. The research has the following components: 1) reviewing the social cultural meanings of the rice terraces before the registration, and tracing the influences of national tourism policy since the 1970s; 2) examining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local NGOs, government and international sponsors, to reveal how the local community has transformed international resources into the opportunity of local development; 3) analyz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heritage economy and identity politics, to reveal that landscape conservation is a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lations. This research concludes that landscape conservation is a dynamic process reflecting the negotiation between different values and images of development. Conserve the culture of landscap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simply conserving the physiography landscape of culture. The methods adopted in this study include

*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thnolog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second-hand information collection and ethnographic fieldwork.

Keywords: Ifugao, Rice Terraces, landscape, landscape conservation, World Heritage.

摘 要

登錄世界遺產，在 1990 年代成為國際間一種文化地景保存的策略，為了解從保護全人類共同資產的廣泛宣稱，進入到在地尺度的實際運作，並探討地景保存與經濟發展、認同政治之關係，本文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登錄為世界遺產的菲律賓伊富高梯田為例，運用二手資料收集、民族誌田野調查等方法，進行以下工作：1) 追溯登錄世界遺產之前，伊富高梯田與其社會文化的關係，以及國家啟動觀光之發展政策所帶來的影響；2) 檢視登錄世界遺產之後，在地非政府組織與地方政府、國際資源間的互動，以及如何以「拯救梯田」的機會，形成符合在地發展期待的作法；3) 分析這個過程中，遺產經濟和認同政治的關係，以及在地透過地景保存行動再建構其社會關係的意義。最後，本文指出，地景不僅是人類活動歷史的靜態軌跡，地景保存更是當下不同價值、意識型態與發展想像之間對抗/協商的動態過程，對地景保存的思考，應注重社會和地景管理的關係，而非僅是地景表面形象的維護。

關鍵字：伊富高、地景保存、世界遺產、認同政治、遺產經濟

前 言

地景 (landscape)¹，是源自視覺感知的地理經驗，不同視角常會產生不同的感知，這樣的感知除了物理形象，也有對其意義與價值的體會。所謂不同視角，除了指觀看者在物理空間中相對位置的不同，也可延伸用來指涉因為社會關係、文化因素而產生的差別。另一方面，作為具體的空間形式，地景是人類活動留下的印記，是感知時間的一種方式，因此地景保存，也就是人們連結過去、延續未來的行動，其必然涉及不同觀點間，對過去之詮釋、未來之期待的差異。自 1990 年代起，聯合國將文化地景列入登錄世界遺產 (World Heritage) 的對象，據其宗旨，乃是希冀彰顯世界遺產作為全人類共享之資產的價值，並透過全人類之力量善盡保護管理工作，本文之研究目的，則是探討當「世界遺產」作為全人類共同資產的廣泛宣稱，進入到在地尺度，會如何牽動在地社會，而在地的回應又涉及那些政治、經濟，乃至文化因素與考量。

在地 (local)，是一個相對概念，在地性 (locality) 常是在各種不同力量對比時被界定出來，而隨著對比的尺度²變動，在地的意涵也會有所調整 (楊弘任 2011: 6)。本研究將從相對於「國際」之「在地」，也就是菲律賓國內政經與族群關係脈絡，進入到相對於菲律賓「全國」之「在地」，也就是伊高省 (Ifugao) 中之特定地點的地景保存經驗。在這兩個層次的「在地」之間的動態轉變，意味隨著論述階段的進展，逐步檢視相對於「國際」、相對於「全國」之不同作用因素，並從這些因素，來理解事物意義。

本文以菲律賓伊富高省為研究案例，除了因為在人地條件上，伊富高省極具未來發展與台灣山地社會之比較研究的潛力³之外，更重要的是它在世界遺產之地景保存行動中的角色。在伊富高山地形成大規模人工灌溉系統的水稻梯田，常被譽為是世界八大奇景之一，它和 1950 年代人類學家建構之菲律賓族群關係理論有關，甚至被做為歷史教科書中的教材，正是反映出地景如何連結了人群社會的現在與過去，並且具體化我群認同之極佳例子；在 1970 年代被菲律賓政府作為發展當地觀光的宣傳之後，此一地景於 1995 年被聯合國世界教科文組織登錄為世界遺產，隨之一度因為部分地區梯田地景快速崩壞而遭列入瀕危名單，經當地成立非政府組織「拯救」梯田地景後，成功從瀕危名單除名，但至今仍持續面對經濟模式變遷而帶來對保存梯田地景的挑戰。

基於前述研究目的，本文在介紹研究案例地點背景、回顧地景保存相關理論之後，將追溯伊富高梯田地景在傳統社會之政治權力、經濟生產的意義，並探討其被指定為世界遺產前、指定為世界遺產後的變化，接著就其經驗，分析認同政治、遺產經濟與地景保存三者間的關係，進而思考這樣的經驗可以對地景保存有什麼啟發。

研究背景

菲律賓由 7 千多個島嶼組成，自北而南可分成 Luzon (呂宋)、Visaya (毗舍耶)、Mindanao (民答那峨) 三大島群，並根據地理與文化特色進一步劃分成 18 個行政地區 (region)，圖 1 所示為各島群中的行政地區。根據最近一次的官方人口統計⁴，菲律賓的總人口超過 1 億零 98 萬人，其中呂宋島的人口為 5 千 747 萬人，本研究田野地點伊富高省所在之 Cordilleras (柯地雷拉) 地區⁵的人口為 172 萬人，而伊富高省本身的人口則為 20 萬。

菲律賓境內眾多的人口中，使用多達 187 種不同的語言，且大部份皆屬南島語系，菲律賓的族群基本上可分做三類：1) 主流族群，占了菲律賓總人口的 85%，主要分佈在低地平原地區，這些人口使用的語言可歸類為八個語言家族，包含 Taglog、Cebuano、Ilokano、Hiligaynon/Ilonggo、Bikol、Waray/Samar-Leyte、Kapampangan、Pangasinan 等，生活在低地平原地區的族群經西班牙殖民 300 多年的統治，已改宗信仰天主教，並深受西方文化的影響；2) 穆斯林，主要分佈在民答那峨及其周邊島嶼；3) 分佈在呂宋山區、民答那峨山區，與中部島嶼等地的原住民族。這三種分類內部都存有非常多互有差異、使用不同語言的族群 (McFarland 2009; Gera 2015; CIA 2020; 謝國斌 2016)。

伊富高全境面積 2,628 平方公里，屬於山地地形，最高峰約為海拔 3,000 公尺，數條主要河流為西北往東南向，切割出陡峭的河谷，這些河流在伊富高的南緣匯入 Magat 河後，以西南往東北向流入其他省份，而在呂宋島北部出海。伊富高人內部包含 Tuwali、Ayangan、Kalanguya、Hapuwan、Henanga 等幾種語言分支。歷史上對科地雷拉人 (包含伊富高人) 的描述，可見於十六世紀西班牙殖民時期的紀錄，1572 年來菲律賓淘金的歐洲人在低地和他們有所接觸而稱其為 Igorots (為低地 Tagalog 語，指高地人之意) (Scott 1974)。西班牙人為了開採在 Benguet 的金礦，以及為了將高地人「馴化」為天主教徒，曾經在科地雷拉地區及附近發動了多次的軍事行動，但由於伊富高人的反抗，西班牙人對科地雷拉地區的控制處於模糊不清的狀態。



資料來源：修改自 <http://www.apexe.org/mbbs-in-philippines.php>。

圖 1 菲律賓的行政地區分布及伊富高 (Ifugao) 在柯地雷拉 (Cordilleras) 中的位置
Fig. 1. The administrative regions of Philippines and the location of Ifugao in Cordilleras.

西班牙人在 1750 年首次踏查伊富高的 Kiangán 時，知道了其在坡地砌石牆所形成的水稻梯田，並在 1801 年用文字將其紀錄下來 (Scott 1974: 199)；1868 年歐洲人發現伊富高的 Banaue 此一人口最密集的山谷 (Scott 1974: 238)；1910 年代，有人類學家探討此地的社會組織與習慣法 (Barton 1919)。20 世紀初，早期菲律賓人類學重要學者相繼對此地展開調查 (Barton 1919, 1922; Beyer 1926, 1955)；1920 年代至 1960 年代間 Lambrecht (1929, 1962, 1967) 記錄了伊富高的建築、宗教及古調吟唱；1960 年至 1980 年間，長期研究菲律賓原住民農業生態知識而提出 ethno-ecological approach 一詞的生態人類學者 Conklin (1967, 1980)，描述了伊富高農業系統與土地利用，並用地圖將此地的梯田分布一一描繪記錄。這些研究的累積，使得伊富高成為民族生態研究的熱點。

理論回顧

(一) 地景

地景 (landscape) 來自德文的 *landschaft* 一詞，其原意為土地的外觀，最早在德國地理學中被用來統稱一個區域之地形、植被、水文等形貌，而早期的地景研究，即是在區域地理與自然地理的架構下，探討區域間的地表形貌特徵、差異與變化。1960 年代，Carl Sauer 提出文化地景 (cultural landscape) 的觀念，為地景研究帶來了新的取向和方法論思考，其認為人類活動所及的地區，所有的地景都是人類

與自然互動下的結果⁶，因此對於地景的分析，應深入對於其形成這些地景之人類社會政治經濟過程的解讀，而非僅是視覺可見之形貌的描述、分類與比較。

1970 年代，人文主義地理學者段義孚在 *Topophilia* 一作中，討論不同人群文化中的世界觀、宇宙秩序，和其生活環境中之地景間的關係 (Tuan 1974)，而相較於段義孚後來提出來之地方 (place) 概念所強調之以情感價值連結賦予世界意義的地理經驗，地景乃是人經由觀看、詮釋和營造等過程賦予土地文化性的意義，它不是地方概念所強調對特定地點的聚焦，而是一種視覺上對連續、延展之型態的感受與認知 (Meinig 1979: 1-10; 康旻杰 2017: 51)。因此，Cresswell (2004) 指出，地方是一種存有的方式 (a way of being)，而地景則是一種觀看的方式 (a way of seeing)。另一方面，1980 以後，延續將地景作為一種視覺經驗的結果與分析的對象，對生態系統中動植物棲地之形貌的模式 (pattern) 的分類 (例如植被區塊、河流廊道、區塊中的點狀岩石鑲嵌)、各種模式間的組合與變遷，以及其與生態系統運作功能之關係進行的探討，發展成為地景生態學 (landscape ecology) (Forman 1995a, 1995b; Forman and Hersperger 1996)。

1990 年代以後，不同於將地景僅作為一種視覺經驗，Feld (1996) 則認為在多重知覺上，自然環境中所予人的聲音、氣味與觸覺，會是需要被納入考量的要素，而 Macnaughten and Urry (1998: 110) 更挑戰將地景當作一種客觀的經驗對象，提出內在視角 (Inner Eye) 的概念，提醒任何觀看的發生必定存在特定的觀看位置和觀看方式，這樣的想法進一步影響到 2000 年代以後，以語言為切入工具，強調從一個民族的文化脈絡來理解其對地景的感知、命名、分類、象徵、利用、管理之民族地形學 (ethno-physiography) 研究的誕生 (Mark et al. 2011)。

基於上述的脈絡，對地景的研究，如今存在兩個主要的取向，一是生態學式的，另一則是符號學式 (semiotic) 的取向 (Cosgrove 2003: 15)：前者將地景視為客觀的視覺對象，著重於物理型態的描述、分類跟比較；後者則強調地景的意義乃是經過社會文化的建構，其對地景的研究，著重於探討塑造出地景的政治經濟力量、分析地景反映的政治經濟結構，或是觀照賦予地景意義之人群內部的文化邏輯。其中，民族地形學強調從一個民族的文化脈絡，來理解其地景意義，則有跨越兩種分立之取向的潛力，因為它一方面關注該民族對地形型態的描述與分類，一方面嘗試貼近其文化脈絡以理解這些描述與分類的邏輯。其對文化主體詮釋的探求，正是本研究所重視的方向。

(二) 地景保存

最早透過國家的力量進行地景保存的經驗，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末期美國自然保護思想下所設立的黃石國家公園，而為了保護「自然」，這樣的地景保存作法是將人排除在地景之外 (盧道杰等 2006: 3)，前述 1960 年代柏克萊學派提倡之文化地景觀念出現之後，排除式的地景保存亦受到反省。1968 年世界自然保護聯盟提議將文化和自然聯合起來進行保護；1972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斯德哥爾摩召開人類環境會議並發表了《人類環境宣言》，同年也在巴黎通過《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並在聯合國總部成立世界遺產中心，開始審查與登錄世界遺產名錄；1992 年的《世界遺產公約》(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 首次正式認定文化地景 (cultural landscape) 是屬於文化遺產的一類，並列為保護的對象。

1993 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生物多樣性公約》，其中指出應尊重、保護、以及維持跟保育與生物

多樣性的可持續使用相關的原住民及當地社群的知識、洞見以及實踐，並透過這些知識、洞見、與實踐擁有者的允許與參與，提升它的應用性，也鼓勵原住民及當地社群從這些知識、洞見、與實踐的使用在獲利上得以公平地分享（第八條 J 款），這顯示了保育典範的轉移、反映了 1980 年代開始的新自由主義思維⁷，也同樣影響了地景保存的作法，更重視社區參與的重要；2004 年生物多樣性公約會員國大會正式將社區參與列入決議事項（盧道杰等 2006: 3）；2007 年在紐西蘭基督城召開的第 27 屆世界遺產委員會，為強調原住民和在地社區對世界遺產保存的重要性，因此將社區參列為其策略目標，並且增訂於世界遺產公約作業準則之中，顯示出公私部門合作、社區參與，已成為國際間地景保存的重要策略（李光中 2010: 22；李光中、王鑫、蔡嘉玲 2012: 29；李光中 2014: 52）。

（三）地景保存的政治經濟

從政治的角度來看，地景保存既然是人類社會的行動，必然涉及人類社會中之權力對抗、合作、協商。就保育而言，保育團體所追求的目標，和在地原住民社群的關注和利益未必是完全一致的（例如，保育團體追求的是生物多樣性，但在地原住民社群則有經濟、資源利用的考量），而文化地景保存，由於是以地景為對象而非物種，因此教具整合性，也就成為保育計畫中經常用來整合保育目的與地方發展需求、連結在地文化觀點並爭取在地支持的平台（Walter and Hamilton 2014）。另一方面，對在地原住民社群來說，文化地景經常是承載了其祖先存在的紀錄與活動的軌跡，而保存這些紀錄與軌跡（Sheppard et al. 2002; Thomas 2012），和集體記憶的建構、認同的塑造，乃至特定社會秩序或權利安排的正當性，都有關係（Ashmore and Knapp 1999）。因此，以文化地景保存來整合保育目的與地方發展需求的做法，就成了保育政治與身份政治交匯的結果。

更進一步來看，地景保存的政治，不只是為了達成保存目的與在地社群合作協商而已。地景保存本身，是一種經由詮釋過去，連結個人與集體認同的方法（Kirshenblatt-Gimblett 1998: 7），地景保存的行動，就是在生產、分享、賦予關於過去歷史的意義（Hoelscher 2006: 200），因此，其不可避免的涉及誰來決定、如何決定，以及什麼的認同和歷史意義該被彰顯的政治。當地景成為生活中習以為常的一部分，其背後的權力關係也就內化在社會生活的場景之中（Duncan and Duncan 1988）。地景保存不僅保存了地景的物質性、賦予其象徵意義，也具體化了權力關係。當它國族論述相結合時，更是為國族主義的想像提供了物質性的基礎與形式，因此對於地景保存之批判性的思考，應該是要檢視其和過去歷史的記憶化，以及公共記憶空間化之間的關係（Johnson 1995: 63；張碧君 2013: 4）。

從經濟的角度來看，地景亦是反映了一個社會生產的技術、勞動力組織的模式、資源分配與消費的過程。舉例來說，耕作的作物、灌溉的渠道、聚落的規模、輸送的道路，市場的位置等等，都是經濟地景的一部分，Farina (2000: 316-7) 更指出，全球化已經造成過去各自獨立之生產系統所形成的地景，被連結到一個全球性、更大的地景結構之中。在地景保存的運動中，經濟亦是一個重要的面向，因為論證地景保存的經濟價值，可作為支持地景保存之決策依據。論者通常以市場指標與投入 / 產出模型為工具，分析地景保存如何影響經濟收入、創造就業、稅收和經濟產出。以森林保存為例，其負面影響是林業的稅收和就業機會減少，但其正面影響則是增加以自然遊覽為基調的旅遊業、增加相關就業機會。就文化地景而言，作為展現歷史的一種方式，文化地景的保存亦可以成為重要經濟收益的來源（Hoelscher 2006: 200）。然而，除了市場指標可衡量的影響之外，地景保存還可能有其他的價值，

福祉經濟學取向的研究強調應更全面的將非使用價值納入評估地景保存的考量，例如美學的感受、生物多樣性的貢獻等，並以機會成本的概念，設計評估程序⁸，以量化其價值 (Gisselman et al. 2017: 23-53)。從市場指標到更全面的非使用價值，可以看出地景保存往往是兼具正負面效果，因此，地景保存與否，也就反映了發展模式的選擇與拉鋸。

地景保存的政治與經濟並非二分，而是交互影響。Zukin (1993) 就以 Weirton 此一美國工業地景中常見之鋼鐵業為主要就業人口的城鎮，透過社區集體成功收購鋼鐵公司並獲得聯邦政府都市發展計畫補助，而維持市場經濟與社區責任之平衡的案例，指出連結在地與全球資本，是其能夠重生的重要因素。吳幸玲 (2008) 的研究則指出，雖著經濟型態的轉變，工業主義下之生產地景 (工業設施、工廠) 逐漸轉變為後現代之消費地景 (購物中心、商城)，住宅地景的塑造背後。亦連結了資本獲利以及創造象徵意義的文化權力。此外，張碧君 (2013) 對新加坡中國城之研究，則批判為了吸引觀光商機，由上而下塑造符合全球化之國族建構下的中國城意象，造成摧毀地方集體記憶之危機。這些案例都顯示了，藉由對地景具體空間形式之保存行動的分析，正有助於看到政治與經濟運作之抽象機制，以及它們之間的交互作用，而這也是本文所欲採取的方向。

研究方法

綜合以上的思考，本文所謂的「在地視角」，其指涉的是在逐步檢視相對於「國際」、相對於「全國」尺度之在地政治經濟因素的同時，應理解伊富高文化中梯田地景的意義。換句話說，這並非忽略視覺上的感知，而是更要從該民族的角度理解他們看到什麼。基於這樣的理念，本研究運用之資料收集方法，包括四個部分：(1) 二手文獻資料收集；(2) 實地踏查 (參見附錄表 1)，踏查地點包含登錄世界遺產的四處梯田群所在地點: Banaue、Mayoyao、Hungduan、Kiangang (參見圖 2)，以及與梯田地景保存相關的場所或活動場合；(3) 焦點座談 (參見附錄表 2)，對象包含在地非政府組織工作者、支持地景保育的國際團體，以及地方政府官員與農民；(4) 深度訪談 (參見附錄表 3)，對象包含個別農民、NGO 工作者與地方意見領袖，受訪者的名單則是透過滾雪球法的方式逐步建立。以上 (2)、(3)、(4) 三個部分，主要在 2015 年 7 月、2016 年 7 月、2018 年 7 月、2019 年 7 月間的田野工作中陸續完成。

登錄世遺之前：從農業到觀光的引進

(一) 民族誌中的梯田與社會

梯田是伊富高人生產食用之稻米的來源，而其社會組織也和稻米的生產有很大的關係。伊富高的聚落由在同一地區擁有較多田地的家族為核心，與不具親屬關係之鄰居間的連結，則建立在共同的環境與生產需求上，但主要的社會運作還是以血緣為基礎的親屬關係為核心，形成繼承、訴訟、賠償等集體責任 (Conklin 1980: 6)。

伊富高的繼嗣制度屬於雙系繼嗣 (意指子女可以繼承來自父方和母方的財產) 且為長嗣繼承 (第一胎出生者，不論男女，繼承家中主要財產，也負有比其他兄弟姊妹更多的責任)。如果一個家族成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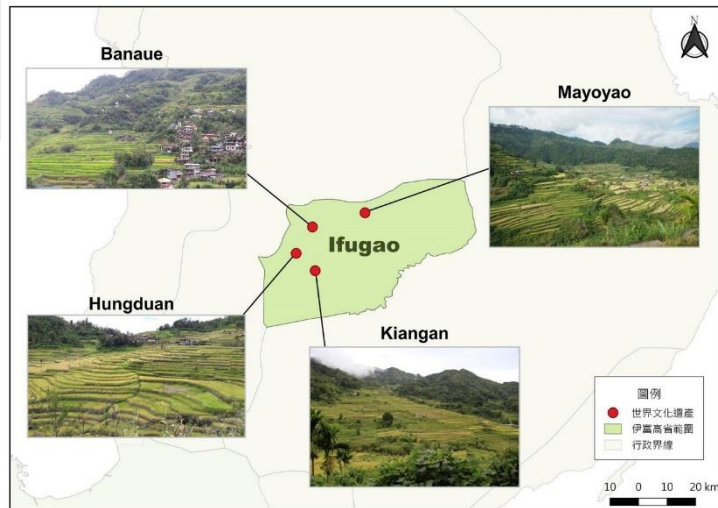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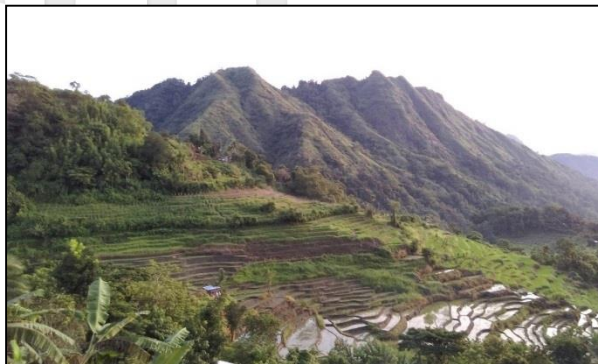
圖 2 伊富高登錄為世界遺產的四處梯田群所在位置

Fig. 2. The locations of terraces registered as world heritage in Ifugao.

被不同家族的人欺負，那麼這個衝突將會包含雙邊親屬群體中所有的成員 (Dulawan 2001: 5)，而涉及農業生產和解決衝突時，長嗣則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Acabado 2013)。在這樣的制度下，生產、親屬、祭儀、政治之間皆高度相關 (舉例來說，祭儀是確認和祖先的關係，也就是確認財產繼承，以及長嗣在公共事務中的發言地位)，因此乃有學者指出，祖先在伊富高人的宇宙觀、政治與生活實踐中，皆有重要意義 (Barton 1922; Scott 1974)，也有學者指出伊富高文化中，人和人之間的互動，常受到祖先、社會地位和繼承財產關係等規則的影響 (Conklin 1967, 1980; Dulawan 2001)。

圖 3 為常見的伊富高梯田地景，它顯示了靠近陵線的區塊仍為森林，而圖 4 則是水稻梯田地景相關的土地利用模式示意，它顯示此一地景中，乃是包含了不同的土地利用類型所複合組成一個生產體系。其中，有兩種類型的林地—Inalahan/hinuob (公共森林) 與 muyong/pinugo (家族或私人擁有、有明確邊界的林地)；ha-bal (燒墾地—沒有灌溉的坡地，種植根莖作物，例如地瓜)；latangan (家屋附近的梯田，同時也是居住區域)；na-ilid (有排水的農地、整平的梯田，常用來種植旱作，例如地瓜和豆類)；payoh (有灌溉、整平的梯田，種植稻米) (Acabado 2012: 504)。維持伊富高農業生產其中一個關鍵是 muyong/pinugo (家族或私有林地)，其所涵養的水資源是該流域下游梯田所需水源，更重要的是，森林中的採集、燒墾地的粗放農業和水稻梯田的集約農業，彼此之間形成互補的關係，燒墾農田分布在梯田之中，當梯田的產量無法提供給居民充足的碳水化合物時，需燒墾農業產出的作物來補足食物來源，另燒墾農業和水稻梯田兩種農業型態的勞動時節不同，因此兩種農業的工作可互相配合，多種生產方式的並存因此多颱風的環境下一種風險控管的策略 (Acabado and Martin 2015: 28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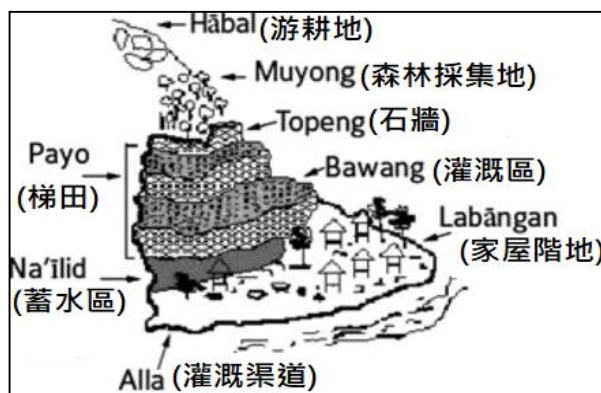
梯田地景中不同土地利用類型間的轉換，也反映出社會內部的動力。在伊富高的產權制度中，水稻梯田屬於以家族為核心進行維護的私人財產，稻米不僅是物質性的財富也是地位的象徵，而在伊富高社會存在著擁有大量水稻梯田的大家族，但另一方面，燒墾農田則是半私有的財產，是村落公共財產和私人稻田間的一種產權的緩衝，若要將其開墾成稻田而成為私人財產，需要經過一連串昂貴而不



照片來源：本研究拍攝。時間 2015.07；地點 Kiangan。

圖 3 伊富高常見的水稻梯田地景

Fig. 3. A scene of terrace in Ifugao.



資料來源：翻譯自 Acabado (2010: 83)，原圖中梯田之說明取自 Conklin (1980: 16)。

圖 4 伊富高的土地利用模式示意

Fig. 4. The land-use pattern in Ifugao terrace.

易達成的宴席和儀式才能宣稱所有權 (Acabado and Martin 2015: 276-9)，因此在私人追求財富與地位之動力的另外一面，形成文化性的制約力量。依其主體性的詮釋，就是能力比較強者要分享其資源、照顧弱者；就經濟的角度，則為社會內部的重分配⁹。此外，從信仰和歲時祭儀來看，環繞著稻米耕作週期之祭儀，例如以家族中的祭司 (mumbaki) 舉行儀式啟動一年一穫之水稻播種和灌溉，並對森林的採集及砍伐加以規範 (Ngohayon, Delson-Fang-asan and Dulawan 2015: 76-7)。這再次反映出，伊富高梯田地景，是糧食生產、信仰和社會關係相互交織的文化複合體。

上述不同類型土地間的轉換，展現了這個糧食生產、信仰和社會關係相互交織之文化複合體內部的動態平衡，而若將時距拉長來看，這樣的動態性，不只發生在上述複合體的內部，包含一年一穫之水稻種植的開始，乃至晚近 1970 年代一年二穫之稻米品種的引進，都是更大之動態變遷中的一部分。

(二) 梯田與族群論述的關係

伊富高梯田不只是學術研究的熱門對象，關於伊富高水稻梯田從何時開始、存在多久的歷史，也成為菲律賓國族論述的一部分，而現今菲律賓國族論述的架構，則必須回到殖民的脈絡來理解。

從 16 世紀西班牙殖民開始，西班牙人大力宣揚天主教，消滅低地平原地區的伊斯蘭文化，但並無法有效統治山區及南部部分地區；19 世紀末美西戰爭後，西班牙將菲律賓割讓給美國，使其成為美國殖民地。美國殖民時期，為了統治之便，將西班牙殖民時期無法有效統治、未基督教化的人群全部劃為一類，稱之作 Non-Christian Tribes，並設立了「未基督化部族事務局」。二戰期間菲律賓短暫被日本佔領，戰後於 1946 年獨立。菲律賓獨立後，對於這些早期未基督化之人群的名稱屢有更改，並將穆斯林社群獨立出來另外成立治理單位，而將早期同屬「未基督化部族」的人群，分成為「南方的穆斯林」和「原住民族」。這裡的「原住民族」，也就是包含了伊富高在內之科地雷拉地區人群。

在菲律賓的脈絡中，生活在平地、自西班牙殖民時期改信天主教的人群，常將「原住民族」與未基督化、不文明的意象連結在一起；而在科地雷拉地區，則有自己祖先勇於抵抗、不屈服於西班牙殖民，而不同於「低地人」的「高地人」認同。菲律賓對於各族群之來源的主流理論，支持了「低地人」、「高地人」的分類架構，而這樣的理論，可追溯至被稱為菲律賓人類學之父的 Henry Otley Beyer。Beyer 來自美國、從 1914 起擔任菲律賓大學人類系系主任達 40 年之久，根據他的 Waves of Migration Theory，菲律賓的土地上曾經存在有幾波的人種：第一波是 250,000 年左右類似爪哇猿人、北京猿人的直立人；第二波是 25,000 到 30,000 年之間經由陸橋移入的矮黑人；第三波是新石器時代的印度尼西亞人種，經由海洋的航行到達菲律賓，移入時間距今約 5,000 到 6,000 年；第四波則是更為進步的馬來人種，經由海洋航行，在西班牙殖民之前到達並將製鐵的技術帶入菲律賓。在這幾波到達時間先後不同的人種之中，越後到達者文明進化程度越高，而在伊富高興建水稻梯田的，也就是殖民接觸後仍「未基督化」的部族，正是第三波到達的印度尼西亞人種，他們在第四波移入者來到前進入到山地地區生活 (Beyer 1947, 1955)。

儘管缺乏足夠的證據，但 Beyer 的理論卻為菲律賓族群論述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它以人種差異為解釋，清楚的在高山人（第三波移入的印度尼西亞人種）和低地人（第四波移入的馬來人種）之間，劃出了一個文明較落後 / 較進步的序階。根據 Beyer (1947, 1955) 的說法，伊富高的水稻梯田存在應該超過 2,000 年以上，這樣的說法成為菲律賓的主流族群論述的一部分，甚至成為教科書中的內容 (Rama et al. 2006; Anda 2010)，其認為 2000 年歷史的梯田，正是高山人在山區發展出自給自足生活方式的代表，也更強化了高山人與低地人不同時期來到菲律賓、分屬不同人種、各有各演化路徑的分野。

(三) 發展所帶來的梯田變遷

馬可仕執政期間的菲律賓政府為發展觀光，於 1973 年將伊富高之 Banaue 梯田地景指定為國家級文化遺產 (Presidential Decree No. 260)，且為了配合發展觀光的政策，整修升級了通往 Banaue 的道路，於是 Banaue 隨著道路改善而首先成為遊客造訪的重要景點，小型旅館、餐廳逐漸增加，菲律賓觀光局 (Philippines Tourism Authority) 更加碼投入興建了可以容納 500 人的飯店；1978 年，Banaue 首度舉辦為吸引觀光客而設計的文化節 (Banaue Imbayah¹⁰ Festival)；1980 年代，伊富高的觀光旅遊快速成長而進入一波高峰 (SITMo 2008: 29-30)，而因應觀光需求，建築物迅速而混亂無章法的增加，造成景觀的大幅改變。

另一方面，1970 年代，菲律賓政府的綠色革命計畫來到伊富高，開始引進低地一年二穫的低地稻米品種 (Clawson 1985; Stone and Glover 2016)，1980 年代則引進外來種的蝸牛至伊富高，希望作為農民補充食物的來源，但是這些外來種的蝸牛威脅了原生貝殼類及植物的生存，也使得原生種高地水稻產量下降，於是部分農民開始使用殺蟲劑、改種生長較快速的低地稻米以作為因應，而當觀光業在 Banaue 興起之後，則有農民轉作蔬菜、水果等經濟價值較高且觀光業有需求的作物，甚至是棄耕；在公 / 私有森林的部分，也因為觀光業中木雕商品的需求，而被大量的砍伐或改種生長較快的樹種 (Guimbatan and Baguilat 2006: 65)，這連帶使得原本森林水源涵養的功能銳減、土砂流失、梯田毀損 (SITMo 2008: 53)。

登錄世遺之後:觀光中重構象徵意義

(一) 以拯救梯田為名的組織

1995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菲律賓政府的申請，以符合其第 (iii)、(iv)、(v) 項標準之理由，將伊富高中之 Banaue、Mayoyao、Hungduan、Kangan 等市 (municipality) 的梯田登錄為世界文化遺產¹¹(SITMo 2008:18)。如此一來，此一世界級的地景，能夠得到關注不只來自國內，也來自國際¹²。

就經濟面而言，登錄為世界文化遺產後，整個伊富高地區的到訪觀光客逐年增加，在 1997 年到達成長率近 60%，1998 年到 2002 年之間，觀光客人數因為亞洲金融風暴、波斯灣戰爭、美國 911 恐攻事件等國際因素而受挫下降，但 2002 年之後又再度攀升，甚至在 2004 年到達觀光客人數成長率超過 80% 的蓬勃發展，而這些觀光客造訪的地方，85% 是集中在 Banaue 這個最早以梯田地景為主題而發展起來的觀光城鎮，而其年度就業率的高低和觀光客人數的成長率起伏成正相關的情況，顯示出觀光和當地經濟收入的密切關聯性 (SITMo 2008: 30-1)。

但另一方面，隨著登錄世遺而加速的觀光成長，使得前述餐廳、民宿增加而建築景觀混亂的現象增加，於是，在 1995 登錄世界文化遺產後不久，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 2001 年將伊富高的梯田地景列入瀕危文化遺產名單 (Tilliger et al. 2015: 889)。同年，國際文化紀念物與歷史場所委員會 (ICOMOS) 及國際自然保護聯盟 (IUCN) 的聯合代表團到訪伊富高，並針對梯田荒廢的情況，提出幾個保育的作法，包括：思考適當強化制度安排、提供資金、短期工作方案、旅遊業發展、長期方案規劃以及連結國際資源等建議 (Nozawa et al. 2008: 77)；2002 年，伊富高省政府成立伊富高水稻梯田及文化遺產辦公室 (Ifugao Rice Terraces and Cultural Heritage Office; IRTCHO) 取代先前一個任務性的工作小組，並在 2006 年將 IRTCHO 改制為常設的伊富高文化遺產辦公室 (Ifugao Cultural Heritage Office; ICHO) 以回應國際間對於保育梯田地景保育之呼籲。

不久，在伊富高的民間社會，於 2001 年成立了「拯救伊富高梯田運動」(Save Ifugao Terraces Movement, SITMo) 組織，回應列入瀕危文化遺產名單的危機。此一組織以保護伊富高水稻梯田文化為核心號召，多年來投入梯田復育、梯田生態觀光、織品與雕刻產業銷售、傳統歌舞復振、地方土地利用規劃等多面向的工作，並與伊富高農民陣線 (Ifugao Peasant Movement, IPM) 合作，協助在地農民發展農產品的加工、有機種植等事項。

要理解「拯救伊富高梯田運動」組織，則必須從認識菲律賓非政府組織發展的背景開始。殖民時期殖民者在菲律賓低地的統治模式，是和大家族合作，使土地大量集中在少數地主手上，即使到了獨立之後，大地主仍高度掌握政治經濟權力，這使得幾波的土地改革都不盡成功。1950年代，菲律賓最早的非政府組織—「菲律賓農村改造運動」(Philippines Rural Reconstruction Movement, PRRM) 成立，其宗旨是希望透過農村的生產技術的改進和小農合作生產組織，提升農民的生活；1960年，則有主張共產主義的新人民軍 (New Peoples' Army, NPA) 興起；1980年代，人民革命之後的柯拉蓉政府，為解決馬可仕政權留下的經濟衰退問題，鼓勵人民成立非政府組織，1990年代初期並立法授權非政府組織介入地方政府治理事務，規定在市的市政發展議會 Municipal Development Council (MDC) 中的成員，必須有四分之一以上是來自非政府組織的代表 (Local Government Code 1991)。

在伊富高地區，中央政府行政力量的控制相較於平地更為薄弱而顯鞭長莫及，因此，和政府合作之非政府組織，是引進資源、處理公共事務的重要管道，但另一方面，反政府的新人民軍¹³亦同時存在此地區。此外，此地區還有1980年代成立的柯地雷拉人民聯盟 (Cordillera Peoples Alliance, CPA) (前述伊富高農民陣線亦屬此聯盟的一員。柯地雷拉人民聯盟起因自反對1970年代菲律賓政府與世界銀行合作在此地透過軍隊脅迫強力推動的水壩興建計畫，1980年代成立至今的聯盟，不同於新人民軍強調階級意識，強調的是原住民族和土地的關係以及土地權利，其為紀念在抗爭中被殺害的意見領袖而每年舉辦的科地雷拉日，也成為菲律賓每年最盛大的原住民活動。近年來，伊富高省政府也開始舉辦官方之紀念科地雷拉日的活動¹⁴。

就政治光譜而言，強調階級革命之新人民軍，在伊富高地區未必受到廣泛的支持，其中一個原因，是此地有其自成體系的社會組織，包括透過家族網絡形成的相互照顧責任與社會支持系統，因此即使家族之間土地擁有的多寡有所差別，但不像低地地區有嚴重的階級衝突 (賴奕諭 2017)，而「拯救伊富高梯田運動」組織，則和仍帶有社會分配正義色彩，但採取溫和改革路線之「菲律賓農村改造運動」組織，有直接的關係。「拯救伊富高梯田運動」組織於2001年在「菲律賓農村改造運動」組織支持下成立 (Ananayo and Richins 2016: 223)，其董事會由地方社會與政治領袖組成，而執行長則是由具有豐富非政府組織經驗、且擁有地方多個重要家族之血緣的青年擔任。這反映出，「拯救伊富高梯田運動」組織，既是由國際地景保育行動所催生，亦是地方政治結構下的產物。

(二) 梯田歷史的爭議與詮釋

登錄為世界遺產之後，伊富高梯田也受到更多學術界的關注。菲律賓籍在美人類學者 Acabado 於2007年來到此地進行博士論文研究，在初步考古挖掘後，質疑伊富高梯田具有2000年歷史的說法 (Acabado 2010)，他為了探討梯田歷史的後續研究一度受到當地排斥，但經過了對話、合作之後，在地組織反而將國際的學術資源，轉化為在地發展的機會。

伊富高梯田具有2,000年歷史的說法，乃源自1950年代的人類學者，並寫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介紹之中，以彰顯保存此一地景的重要性。然而，2,000年歷史的說法並未有實證的考古證據。Acabado 的研究在當地口述歷史中最早形成的聚落遺址進行挖掘，發現殘存水稻種子之土層的年代只有約四百年左右，因此指出，伊富高如今可見大面積的水稻梯田地景形成至今應該只有四百年的歷史，其推測認為伊富高水稻梯田之所以出現並在400年前左右迅速擴大，應該和西班牙殖民政權的出現有

所相關，應是接觸與衝突後，為了避免受到西班牙人的壓迫，而在山區發展出集村的大型社會以及相應的生產系統 (Acabado 2012, 2013; Acabado et al. 2019)。

基於考古證據而提出之伊富高水稻梯田地景形成僅有 400 年的短歷史理論，否定了 Beyer 的「長歷史」(2,000 年) 說法，似乎也減損了伊富高水稻梯田作為世界級寶藏的「價值」，而令觀光旅遊行銷宣傳強調梯田地景有 2,000 年歷史的說法有所尷尬，在某些觀光介紹的網站上，仍持續強調其具 2,000 年歷史的珍貴性。但在聯合國登錄為世界文化遺產地點之一的 Banaue，其景點所立之碑文，就將原本此一人工灌溉系統存在長達 2,000 年歷史的字樣去除。除了觀光宣傳的尷尬之外，此一「短歷史」的理論，亦是挑戰了菲律賓主流族群論述中對於原住民族的想像。在 Beyer 的 Waves of Migration Theory 架構中，伊富高人是屬於第三波移入菲律賓之印度尼西亞人種，其物質文明與生產技術較前一波的矮黑人要高，因此乃在與世隔絕的情況下，自行發展出龐大的水稻灌溉系統，但是如果按照梯田短歷史的理論，則這些大規模梯田的形成就是與殖民者互動下的結果，也就是說，過去認為這些「高地人」未受外界影響的想法應該要修正，且必須重新更細緻的去檢視高地原住民族在歷史上跟殖民者的互動¹⁵。

即使學者認為「短歷史」的討論具有學術上挑戰既有理論的意義，卻「無法貼近人群或是激起在地社群的回響」(徐苡庭 2016: 46)。2011 年，Acabado 接觸 SITMo 執行長，希望於 SITMo 辦公室所在 Kiangnan 市進行考古挖掘，但 Acabado 所提出的短歷史理論，卻被認為這和幾十年來當地人的認知有很大的不同¹⁶，甚至被認為是在質疑伊富高人自 2000 年前即有形成大規模灌溉系統的能力。另一方面，由於在地組織持續希望引進國際資源，因此經過討論後，SITMo 和 Acabado 合作，在 2012 年成立了伊富高考古發掘計畫 (Ifugao Archaeological Project, IAP)，該計畫作為暑期培訓國際考古學生的田野課程基地，除了雇用當地人員協助工作之外，更重要的是每年度挖掘結束，皆在當地進行挖掘成果說明和討論。2016 年開始，這個考古計畫開始在 Kiangnan 市的小學設置了社區文化資源中心，展示考古挖掘獲得的文物，並和小學老師協力，將各項學術研究成果轉化為在地的教材與教學活動。

2016 年，一場於 Kiangnan 市小學舉辦的考古田野成果說明會與座談¹⁷中，SITMo 執行長在與會居民前指出，關於伊富高大規模梯田有 2,000 年之認知，並非來自伊富高人自己的口述歷史解釋，而是 Beyer 的理論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登錄世界文化遺產宣傳推波助瀾下的結果。在這之前，伊富高人自己從未宣稱其水稻梯田有 2,000 年的歷史，對伊富高人來說，2,000 年或 400 年，都是外來者所提出來的數字，但更重要的是回到其自己計算歷史的方式。他也向居民們說道：「誰說這些大片的梯田要兩千年的時間才可以形成？只要給伊富高人一把鋤頭，我們一個月就可以把一整座山開闢成梯田」。換言之，在其詮釋下，短歷史的理論未必就是否定伊富高人的能力。2018 年，IAP 和 SITMo 合作的社區文化資源中心，除了持續前述的工作外，更進一步向國際組織申請經費獲得補助，在中心旁的山坡開闢了新的水稻梯田，作為小學之教學展示區，而社區居民也受邀參與開闢梯田與紀錄工作。

這個從合作到轉化的過程顯示，對當地社區而言，持續擁有開闢與維護梯田的能力，證明這是屬於自己的文化，並由自己來延續這個文化，是比學者對梯田年代考證之爭論來得重要¹⁸。雖然這個過程若沒有學者的善意將無法達成，但它同樣顯示出在地組織將國際學術資源轉化為在地發展機會的能力。

(三) 梯田與不同的發展想像

觀光活動帶來的消費可以提高了當地經濟收入，這件事不難理解，但是關鍵問題在於：誰在觀光的過程中受益？誰又因為觀光而被犧牲？在 Banaue 的經驗中，並非每個人都可以從觀光活動中受益，觀光帶來的收益往往是累積在經營觀光的商家，但很少涓滴 (trickle down) 至真正在維護梯田的農夫身上 (Nozawa et al. 2008: 78)。Banaue 以外的 Mayoyao、Hungduan、Kiangnan 這三個水稻梯田群同樣被登錄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地點，雖然亦逐漸受觀光的影響，但由於並非最主要的觀光活動集中地，因此在意識到上述這些問題後，有了較多調整發展模式的機會。

梯田地景保存，往往是串連了公務人員、學者、專家與地方意見領袖的努力所形成 (Guimbatan and Baguilat 2006: 65)，而其最大的挑戰之一，就是要如何平衡地景保存的目標與經濟上的需求。當國際對維護世界遺產的期待來到在地的尺度，在伊富高大致形成有政府補貼、稻米商品化、社區文化生態旅遊等三類作法，這些不同的作法也反映出對於社會關係的不同期待。

首先，政府補貼的作法，來自省政府轄下的伊富高文化遺產辦公室 (Ifugao Culture Heritage Office, ICHO)。伊富高梯田地景自 2001 年被列入瀕危名單後，於 2012 年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宣布脫離瀕危名單，當被問及這十一年來，菲律賓政府做得最成功的一件事是什麼時，一位 NGO 工作者認為，菲律賓政府做的最成功的一件事，是對外交傳梯田毀損的危機，使得國內外的捐款得以挹注到伊富高¹⁹。伊富高文化遺產辦公室，即是負責將接收到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國農糧組織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 的資金²⁰，統整後發給農民，補貼農民維護梯田，並將成果回報給上述國際組織。

這樣的作法看似可以直接回應國際組織保存主張，但是未必能解決在地居民對發展的需求。舉例來說，伊富高文化遺產辦公室希望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梯田區域中的稻田，受了補助之後不要轉作，而房舍家屋受了補助後則不要改建。在伊富高的土地文化中，梯田的面積並非固定不變的，它會隨著人口/作物的需求，與森林交替轉換、有所消長，把梯田的面積固定下來，並非伊富高的傳統，而在電力、新的建材與生活用品逐漸進入之後，要求特定區域中的家屋不能改建，似乎將其鎖定在一個凍結的時空之中。現實上，轉作、改建仍然發生。另一方面，這樣的作法也產生了灌溉渠道毀損時，人們等待政府補助到來才願意修復的情況，反造成部分梯田的荒廢。

第二種，高地米商品化的作法，則是主要由國際 NGO 與伊富高在地 NGO 合作，希望結合稻米耕作與商品經濟，將原本伊富高人種來自行食用的原生種稻米，推銷成對外銷售的商品，希望使農夫因經濟收益，而有更高的地景保存動機。

伊富高人將稻米分成作「高地米」、「低地米」兩大類²¹，「低地米」指的是前述 1970 年代綠色革命政策下，菲律賓政府引進種植的一年兩穫經濟作物，「高地米」則是傳統上種植的一年一穫作物。高地米具有象徵財富與地位的意義，也被認為是比低地米好吃，高地米不僅耕作周期中有相對的祭儀 (當農民棄耕或轉作之後，環繞著高地米的祭儀也往往隨之停止)，其收割、曬穀的方式也都和低地米不同 (參見圖 5)。為了帶給科地雷拉地區農民「具永續性且文化合適的經濟機會」(Glover and Stone 2017: 3) 以減緩農民棄耕或轉作的危機，2005 年開始，一個以美國為基地的社會企業，組成了國際性的「科地雷拉傳統稻米計劃」(Cordillera Heirloom Rice Project, CHRP)，在伊富高當地與以 Banaue 為基地的水稻

梯田農夫合作社 (Rice Terrace Farmers' Cooperative, RTFC) 合作，將伊富高的原生種稻米銷售到北美地區。另外一個類似的計劃，是位在菲律賓的國際稻米研究中心²² (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 IRRI) 與菲律賓政府的農業部合作，自 2014 年展開的「傳統稻米計劃」(Heirloom Rice Project (HRP))，此計劃除了進行傳統稻米種子的保存外，同樣是推動協助將小農種植的高地米銷售的國外的市場 (Glover and Stone 2017: 5)。



照片來源：陳巧筠 (2016: 83)。

圖 5 高地米 (左) 與低地米 (右) 曬穀方式的差異

Fig. 5. Different ways of drying high-land and low-land rice.

雖然帶著希望保育梯田地景、復振梯田文化的善意，這些連結科地雷拉農夫與市場的努力，卻也帶來了「高地米」作為商品後被單一化的問題。基於提醒消費者購買這些稻米能夠創造的價值，以使其願意用購買這些售價高於大規模機械化生產之商品，這些稻米在北美等國外市場行銷的廣告中，都會被強調是「傳統」、「原生」的，同時廣告也會強調梯田地景的意象。在消費者這端，接收到的訊息其實很簡單而有效的，就是他們是藉由消費在保護「傳統米」，但問題在於：消費者不會有機會進一步去瞭解所謂的高地米其實有許多不同的品系，而不同的品系有其不同的用途，甚至有些品系是在某些村落所特有 (Glover and Stone 2017: 17)；另一方面，消費者的口感有其一定的偏好，經過市場選擇後，銷售商逐漸趨向採用消費者最能接受的品種，於是在市場上銷售之「傳統米」的品種逐漸單一化，又回過頭影響了產地 (包括伊富高) 的農夫趨向種植市場偏好的這個品種，其他品種及相關之用途的知識反而被邊緣化。因為市場選擇造成生物多樣性降低、甚至不利文化多樣性的效果，這是原本這些計劃推動「高地米」商品化抱持之善意所始料未及的，也遭到其他在地 NGO 組織 (例如 SITMo) 的批評²³。

第三種，也就是社區文化生態旅遊的作法，則是希望在滿足收入需求的同時，避免稻米商品化帶來的高地米品系趨向單一的問題，SITMo 推動之社區型生態旅遊即是一例。在 Kiangnan 市之 Nagacadan 村的梯田群，是 UNESCO 指定的世界文化遺產地點之一，自 2013 年起，SITMo 和 Kiangnan 市政府及聯合國農糧組織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 的全球重要農業遺產系統 (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GIAHS) 計畫合作，將此地點設置為一個開放式的戶外博物館 (Open Air Museum) (李孟儒 2016: 54-5)。Nagacadan 村的梯田群位於河谷的兩側，其遊程以團體的方式

進行，到訪者支付每人 350 披索的費用，即可在約 3 公里的路徑中，接受解說與導覽（參見圖 6）。此一戶外博物館的收益則做用於支付導覽人員的費用，區內梯田與設施的維護等。



照片來源：本研究拍攝。時間 2018 年 7 月；地點:Kiangán 及 Asipulu。

圖 6 社區文化生態旅遊中的地景解說導覽（左）以及復振的收穫祭典（右）

Fig. 6. Tour guiding in community cultural eco-tourism (left) and Revitalized Harvest Festival (right).

由於路徑在河谷上下蜿蜒，加上沿途的停留講解，每次的行程大約要花三至四個小時的時間，遊客行走穿越包含了梯田、家屋、森林等地景。此範圍內之土地仍為社區居民所實際耕作、居住使用，因此行走其中可以看到動態的使用情形。舉例來說，在梯田的部分，同時存在著有高地米以及低地米兩種不同作物的生產，也有些稻田被轉作為生產翼豆等經濟作物的用途，而其灌溉的水路系統也會因此而有細微的調整；某些森林地帶會因為新的耕作需要，而被新開闢成田地，但也有些過去的田地因為棄耕而重新長成森林，在林中留下了階梯的地形痕跡；同時，燒墾的行為也在森林中零星的發生，而形成分散的、焦黑、燒墾後的區塊。從親自身入到所謂「梯田」的地景之中，除了見證範圍壯觀的梯田，遊客也可以體會到，梯田、水路、森林、燒墾地、家屋，其實是相互關連且動態消長的一個系統。

經營這樣的文化生態導覽，未必所有的社區成員都可以直接從其中受益，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有能力進行導覽解說。為了克服這樣的問題，在 SITMo 的組織下，Kiangán 的旅遊活動連結了鎮郊的戶外博物館、學校旁之社區文化資源中心，以及鎮中的商品展示中心三個地點，使旅遊相關的活動除了世界文化遺產登錄之梯田群的導覽之外，也涵蓋了織品製作銷售、在地音樂舞蹈的展演。

這些社區型文化生態旅遊中的活動，有兩個特色：首先，雖然存在著和市場銜接、增加經濟收入的目的，但也強調文化意義，例如：鼓勵種植高地米的同時，也鼓勵恢復祭儀活動²⁴（參見圖 6），而在地音樂舞蹈展演，也包含了世代傳承的目的，因此社區中成立之樂舞團體的成員，包括小學的老師以及大學的教授，其工作則包含了在地歌謠的調查與傳承，以及在社區教室中將這些音樂舞蹈教授給青少年，並非單單只是為了迎合觀光客而進行表演²⁵，而織品展售的背後，則是社區文化資源中心推動重拾織布技藝、重新認識傳統織品紋路符號之意涵的努力；再者，這些活動的組織，和在地社會網絡高度結合，SITMo 的執行長來自當地的大家族，進行戶外博物館之梯田地景導覽的人員多數是來自確實擁有梯田土地的家族²⁶，因此對於這些土地的歷史也有更直接的記憶，而沒有土地或土地較少之家族的成員，則仍可以參與織品製作、音樂舞蹈傳承與展演的活動²⁷。雖然是和外部的市場銜接，但是此一社區型的文化生態旅遊，仍依循了社會內部的家族網絡進行動員，也持續著其文化中擁有較多土地者（能力較強者）要照顧土地較少者的邏輯。

比較政府補貼、高地米商品化、社區文化生態旅遊等三種作法（參見表 1），第一種作法簡單直接，但由上而下，未必符合在地發展需求；第二種作法將水稻梯田的保存和經濟收入的結合交給市場邏輯，但在市場選擇下有使作物品種單一化的危機，也容易忽略社會內部分配的問題；第三種作法考量到社會內部分配的問題，但也因為如此，往往必須面對在地政治、家族恩怨的張力²⁸。整體而言，藉由 NGO 進行地方治理的模式，是菲律賓政治經濟脈絡所產生的結構，這個結構使得不同的 NGO 各有其空間去吸納資源、組織人力，推動其關注的事務，它們的作法雖然各有不同，但都是試著藉由保存過去、定義現在，尋找未來發展的可能。

表 1 政府補貼、稻米商品化、社區文化生態旅遊等三種作法的比較

Table 1. Comparison between three models of maintaining the terrace.

作法	地點	推動者	影響
政府補貼	登錄世界遺產的四處梯田群 (Banaue、Mayoyao、Hungduan、Kiangan)	國際：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國農糧組織 伊富高：伊富高文化遺產辦公室	改建、轉作誘因大於補助，仍進行改建和轉作。產生對補助的依賴關係，而非主動維護梯田
高地米商品化	以 Banaue 為核心	國際：科地雷拉傳統稻米計劃 伊富高：水稻梯田農夫合作社	提供主動種植高地米的誘因，但在市場的篩選下，造成了多樣性的降低
社區文化生態旅遊	以 Kiangan 為核心	國際：全球重要農業遺產系統計畫 伊富高：「拯救伊富高梯田運動」組織	非以高地米為直接收入來源，而是以多種活動使有土地或土地較少之家族也能參與獲利

地景保存、認同政治與經濟發展的關係

從菲律賓政府一開始將梯田地景申請登錄為「文化遺產」、為了當代之觀光目的而興建大型旅館，到將「傳統米」商品化以求解決當代經濟情境中棄耕、轉作的問題，再到發展出社區型的文化生態旅遊，伊富高地景保存的經驗，不僅呈現出，登錄世界文化遺產之國際地景保存行動與中央政府的政策，到了地方被重新消化、置放於在地政治經濟脈絡之中的過程，也反映認同政治與遺產經濟之間的辯證關係，以及地景與社會關係動態相互建構的性質。以下即逐一進行分析。

(一) 遺產經濟強化認同政治的作用

聯合國登錄世界文化遺產的目的，是希望為人類的文明或文化傳統留下見證，以本研究案例來說，到了國家政策的層次，則相當程度是將「世界文化遺產」作為吸引觀光客以促進觀光產業的符碼，但

無論如何，既然是以遺產 (heritage) 為名，強調文化地景之歷史性與文化特殊性，藉以展現人類適應生態環境之文化創造的能力，則必然會涉及這是屬於誰的遺產？由誰來訴說以及如何訴說這個遺產的歷史等問題，這也使得創造了這片地景的在地原住民社群，可以透過強調和這片文化地景的關聯性，而增加其發言地位。

如本文先前所述，菲律賓的 NGO 在法律上具有參與地方公共決策的權利，在市政發展議會 Municipal Development Council (MDC) 中的成員，必須有四分之一以上是來自非政府組織的代表。但在伊富高 Kiangán 市的例子中，本研究有受訪者認為，NGO 是政府的 counterpart，並不是所有的民間組織都足以作為政府的 counterpart，在 Kiangán 市僅有 SITMo 是政府的 counterpart，其他的組織例如：農夫協會、舞蹈協會、編織協會等等則都是屬於 SITMo 整合協調的次級團體²⁹。言下之意，SITMo 的影響力非其他的團體所能比擬。而本研究的訪談 Kiangán 市長秘書時，市長秘書（也是長期參與社運的人士，和 SITMo 也有長期的合作）則表示 Kiangán 市的市長不在時，甚至有時會由 SITMo 的執行長來接待外賓³⁰，此組織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雖然 Kiangán 當地早期即有 PRRM 的農村改造非政府組織運動，但這些組織的參與者，在伊富高梯田被列入瀕危文化遺產名單的同一年（2001 年），推動成立 SITMo 此一「拯救伊富高梯田運動」組織，透過和世界地境界保育潮流、國家遺產經議程的結合，在地的非政府組織力量得以尋求更多的國際資金支持，例如：該組織於 2005 年至 2006 年間獲得英國的艾希頓永續能源獎獎助，在 Maggok 和 Bokiawan 社區建設微型水力發電廠的建設；2006 年受日本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會聯盟補助，進行在地水稻梯田相關生態知識紀錄與整理出版的計畫，以培養年輕世代的原住民知識人才；2008 年至 2009 年間則是和推廣強化稻作栽培系統 (System of Rice Intensification) 之國際網絡與資源中心合作，推廣有機的農法。這些國際合作在拯救伊富高梯田運動的號召下，將資源帶入社區各面向的發展計畫，也使拯救伊富高梯田運動組織在地方政治中，強化了其參與公共事務的力量，也就強化了本文之文獻回顧所說的，對特定社會秩序或權利安排的正当性。

(二) 認同政治影響遺產經濟的模式

經濟意味著結合勞動力與土地、資源等生產要素進行生產，以及分配及消費等一系列的過程，而這個過程中，就會涉及誰決定/如何決定生產、分配與消費方式的政治議題，經濟也因此和政治難以脫離關係，而當一個社會連接到更大的外在系統，而非封閉的時候，其政治經濟的網絡也就與外相連，其決策也受到與外界之互動的影響。

Glove and Stone (2017) 曾引用 James Scott 在研究東南亞地區高地後所提出之 *escape agriculture* 的觀念，來解釋高地米之種植對於科地雷拉人羣的意義，所謂的 *escape agriculture* 意指為逃避殖民而發展出來的農業，發展出這樣農業的人們刻意的進行和低地殖民者不一樣的農業操作，避免被其納入殖民的經濟系統之外，因此各種混合的生產方式、不易察覺的作物型態、多元的食物來源，不只是生態學上降低環境風險的意義，還是認同上抵抗殖民吸納的象徵 (Scott 2009)。這正是一個政治上的抵抗影響經濟生產模式的例子。

若以這樣的觀念，來思考「傳統米」商品化一事，固然有和市場機制銜接以經濟上誘因創造個人繼續投入梯田利用與維護的正面動機，但經過實際操作後，產生的效果不僅是生物多樣性降低的問題，

也使原本帶有「逃逸」於殖民體制外之意義的高地農業，被「捕抓」到市場邏輯之中。因為，高地米商品化的做法，僅考量到增加經濟收入的誘因，強化了將個別的農夫，透過 NGO 中介的銷售管道連結到市場，卻未考量社會內部分配的問題；相對來看，不強調將高地米商品化的組織，例如 SITMo，其推動的梯田生態旅遊則結合了多種的收入來源（舞蹈表演、編織展售、生態導覽等），使較多人有機會參與到獲利的機會，則是更強調社會的集體性和社會網絡的維持，而展現出對於發展的另一種想像與期待，這些期待包含維持伊富高作為一個不同於低地社會的、獨特的群體之認同，也包含了維持其自豪的「伊富高的社會或許貧窮，但不會有人挨餓」³¹之道德經濟的精神。

對照本研究的理論回顧可知，遺產經濟，是藉由文化遺產的保存行動，來利用、發揮文化遺產之使用與非使用價值，進而創造經濟上的收益，在伊富高的案例中，兩種不同的途徑（將傳統米商品化、推動社區型文化生態旅遊），都有將梯田地景的形貌加以維持甚至增加面積的機會，但在 Kiangang 作為主要 NGO 力量的 SITMo 選擇了後者，這也形成了一個當代因為政治上的認同，而影響經濟模式的例子。

（三）地景保存與社會關係的再建構

不論是國家的尺度（1973 年的指定國家級文化遺產）或是跨國的尺度（1995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登錄世界文化遺產）下的地景保存行動，其所欲保存的對象，都是聚焦於種植水稻的梯田，也就是偏重梯田這個由人工對土地的改造所產生的結構物，忽略整個地景中其他區塊的管理（例如維護森林作為動物棲地及採集來源）其實也是一種經營成就，而忽略了和梯田相連的社區森林、燒墾地等完整連續的地景，也就不易看到伊富高文化中梯田、森林、燒墾地間之動態轉換的機制。

從「民族誌中的梯田與社會」一節的介紹可以知道，梯田、森林、燒墾地不僅皆屬一個連續的系統中的單元，且單元間也會動態轉換，而其轉換是糧食的需求、環境風險的調控、個人對財富地位的追求、文化中強調分享與重分配的制約等幾組力量交錯下的結果，換言之，梯田、森林、燒墾地間之動態轉換的地景，反映的正是人與人、人與地之間的動態關係。

自 1970 年代開始的道路開通、觀光活動進入，也產生旅館餐廳、蔬果種植等新的土地利用，此時期外界的政治決策與經濟生產的體系對伊富高的影響日深，形塑土地利用的動力也更加複雜，除了前段所述之社會內部中梯田、森林、燒墾地間之動態轉換的機制之外，政府的發展政策，以及外在市場的需求與誘因，都是新的結構的一部份。但是，另一方面，從 SITMo 選擇採取不同於傳統米商品化的策略，讓我們看到了在結構中的能動性。這樣的能動性也提醒我們，我們不應該僅將地景視為人類歷史活動軌跡之靜態紀錄，也不應僅將的地景視為社會關係的被動反映，而是應該看到一個社群對地景保存的策略，影響了其經濟生產、分配的模式，也進一步再建構了其社會關係。

結論：地景保存的再思考

本文從回顧登錄世界遺產前的情況開始，認識伊富高梯田的文化與社會意義，並從殖民的脈絡，理解菲律賓的族群分類、伊富高人在此「高地人」/「低地人」分類架構中的位置，以及梯田與族群論述的關係，並看到 1970 年的政府觀光政策對梯田地景的影響。接著，本文探討登錄世界遺產之後的

變化，特別是梯田被被列入瀕危名單後，非政府組織運用拯救梯田的號召，在地方公共事務決策中強化其重要性，將國際學術資源轉化在地發展的機會，並形成強調社會集體性和維持社會網絡的社區形文化生態旅遊策略，其經驗顯示遺產經濟和認同政治間的關係，也彰顯了地景和社會相互建構的意義。

經由本文的討論，也可加以反省幾個斷裂式的二分邏輯，進而重新思考地景保存的意義：

首先要反省的，是殖民「同化」和「未同化」的二分：追溯歷史脈絡，今日菲律賓原住民族權利法 (IPRA) 中對原住民族的定義，來自於美國殖民時期「未基督化之部族」的分類，主流族群將自身的基督教化視為文明、進步的指標，而將未基督教化的他者視為野蠻、不進步，在這樣的分類架構下，「未基督化之部族」被賦予自始處於蠻荒、與世隔絕的形象，和 Beyer 指高地人與低地人在人種 / 文明程度之差異的理論相互支持，而梯田考古所形成的短歷史理論挑戰了這樣的二分法：如果伊富高梯田是四百多年前才大幅擴張，如果這樣的擴張有可能是因為容納從平地避居至山上的人群，那麼「高地人」與「低地人」之間的界線還是那麼清楚嗎？如果所謂的「高地人」之所以「未基督化」不是因為與世隔絕、無緣被啟迪教化，而是與殖民者互動後的抵抗，那麼「基督化」還是那麼高尚嗎？菲律賓的經驗提醒我們，「同化」 / 「未同化」之過度簡化而斷裂式的二分邏輯，及其所形成的族群論述，很容易排除了人群連續互動及文化接觸後相互影響的多種可能。

再者要反省的，是地景中「梯田」和「非梯田」的二分：自 1973 年的指定國家級文化資產到 1995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登錄世界文化遺產，其所欲保存的對象都偏重梯田地景，而忽略連續地景中其他諸如森林採集地、燒墾地等單元，這樣的態度透露了農業中心主義偏見，其獨尊農耕之價值³²，卻忽略了非農耕（例如狩獵、採集）的地景經營，可使食物在其棲地上源源不絕的產生，所存在的勞動與文化意義。唯有排除這樣的偏見，才能讓我們對「文化」地景有更寬廣的認識。

更進一步來看，保存行動中亦應避免落入「地景」和「社會」的二分：雖然地景有其物質性基礎，但社會更是地景保存不可忽略之關鍵，其原因不僅是因為保存行動必須在人群社會中決策與執行，更根本的來說，還因為地景的意義是由社會所賦予生成，而社會關係也會因地景而被再生產。在伊富高的經驗中，地景的存在，帶來國家區域觀光政策、國際文化遺產保存潮流下的機會與挑戰，而人們藉由對地景意義的詮釋、對地景保存策略的選擇，來回應這些挑戰和機會。地景與社會，在這個過程中不是互不相干，而且是相互建構。由此觀之，地景保存，絕對不會只是一個對於地景之物理性質、視覺可見型態樣貌的保存而已。地景並非不證自明的存在，地景保存也不會僅是一個如何保存物理性質與形態樣貌的技術性問題，既然地景是一個社會定義自我、決定生產分配消費方式之政治經濟過程的一部分，那麼進行地景保存就是進行對於我群認同與經濟模式的選擇。在本研究案例中，即為伊富高作為一個不同於低地社會的、獨特的群體之認同的強化，以及結合重視分享與重分配之文化價值與市場機制的嘗試。

綜合全文之討論，在學理上，本案例之研究，幫助我們將對於地景的概念，從一種靜態的、人類活動歷史的反映或是當代權力關係的投射，延伸至將其視為一種動態的過程；在應用上，本案例之研究則提醒我們，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看到伊富高梯田代表人類歷史上和環境互動經驗的價值，而試圖維持其靜止不變的同時，伊富高在地工作者眼中看到的，卻是整體地景中不同類型土地間的轉換的動態性，以及其不斷滋養照顧人們、維持社會關係的意義，因此，關於地景保存之做法的思考，實應超越對靜態地景表面形象的維護，而更深化到對當代發展、社會組織和地景管理之間動態關係的觀照。

註解

1. 關於 landscape 的中文翻譯，有學者翻譯作「地景」，也有學者翻譯作「景觀」。根據地理學者王鑫 (2014:70) 的討論，前者較強調其作地表現象的整體性，較能反映出涉及內蘊的土地生態和土地倫理。後者則較強調視覺畫面中的地面形象。其亦指出，雖然兩個中文翻譯的名詞強調的重點不同而相輔相成、互不排斥，但在土地規模大、意指土地整體時，使用「地景」此一譯法較能符合其欲指涉對象。因此，就本文所欲探討的內容而言，應以「地景」譯之較為恰當。
2. 早期地理學對於尺度 (scale) 的討論，主要出是政治地理學中運用階層 (hierarchy) 式的架構，呈現世界政治經濟運作的過程，例如 Taylor (1982, 1993) 所提出以世界經濟 (world economy)－國家政治 (nation-state)－在地性 (locality) 等三個尺度，進行世界政治經濟的分析。其中，「在地」意指範圍面積較小、政治經濟運作層級低於國家的地理範疇。但是，隨著對尺度 (scale) 的思考，逐漸從區域面積的概念 (areal concept)，轉向視其為社會網絡的空間形式 (spatial form of social networks)(Cox 1998: 19; Howitt 2003: 146)，再加上對全球/在地之間辯證關係的討論也日益增多 (例如，Harvey 1996；Fagan 1997；McGuirk 1997)，討論尺度被界定和建構的過程，以及討論不同尺度之間的相對關係，就比去定義多小的面積、多低的層級才叫做「在地」，要來得重要 (Delaney and Leitner 1997；Howitt 2003)。關於不同尺度之間的相對關係，以本文之研究來說，若將菲律賓國內的族群文化、認同政治、經濟發展政策等因素，對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球性的登錄世界文遺產行動，那麼這些因素可以說是在地尺度中的作用力；但若以這些菲律賓國內因素來對照伊富高的社會文化、政治動員與對市場的回應，那麼伊富高的社會文化、政治動員與對市場的回應，又反映了另一種在地性。
3. 伊富高省所在的呂宋島與臺灣地理位置相鄰，和臺灣一樣為亞熱帶季風氣候區中的島嶼系統，都有劇烈地質運動下地形破碎而多山的特性，而從考古學、民族學、語言學、神話學 (參見李秀琴 1994、臧振華 2003) 之比較研究，乃至十七世紀西方殖民力量造成的互動紀錄 (參見陳宗仁 2012)，都顯示出兩地人群間的關連，而其和臺灣山地地區原住民族社會，所面對維持傳統與適應國家政治、市場經濟之張力，也有類似之處 (官大偉 2016: 42)。
4. 2015 完成統計，2016 年發布。
5. Cordilleras，西班牙語為高山之意，此行政區包含呂宋島內陸山地地區的六個省分及一個市。
6. 在我國《文化資產保存法》，有「文化景觀」一詞，據其定義，指「人類與自然環境經長時間相互影響所形成具有歷史、美學、民族學或人類學價值之場域」。雖然在翻譯上「文化景觀」一詞可以反推為英文之 cultural landscape，但《文化資產保存法》定義下的文化景觀，較為強調特定價值，未若 Carl Sauer 提出之 cultural landscape 概念寬廣。
7. 新自由主義 (neo-liberalism) 主張「小政府、大市場」，包括在國際間應降低關稅壁壘，促進國際間原物料、資本與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以及在國內使國家應儘量減少對市場的干預，將公共服務的提供交由市場機制等想法。基於這樣的想法，對於保育工作也產生了正負兩面的影響，在正面的部分，是國家減少干預後，社區有機會接手或參與某些公共事務的決策，因此也更加地權力去

中心化 (Fletcher 2010)；在負面的部分，則是將保育工作市場化，自然、環境被過度簡化為創造經濟利益的資源或是商品 (Büscher and Dressler 2012)，而這兩種面向的影響，在本研究之案例中也都可以看到。

8. 例如以調查統計受訪者為了美學的感受而願意為保存某一地景付出的金錢代價。
9. 另一個可以顯示出這種價值觀和重分配機制的例子，是擁有大量土地的大家族（稱為 *kadangyan*），會以置放在家屋下的大型木雕長凳（稱為 *Hagabi*）彰顯其地位，而製作 *Hagabi* 的木材須自高山取得，當 *kadangyan* 從山上取得木材帶回家屋時，則必須要宴請沿途經過的聚落和家戶，這也就成為擁有財富者將其財富分享予他人的機制。
10. *Bayah* 在伊富高的語言中指米酒的意思。本文化節乃是取伊富高傳統中向祖先獻祭用米製作的酒之儀式，而擴大成為觀光活動。
11.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登錄為世界文化遺產標準第 (iii) 項為「能作為一種尚存或已消失的文明或文化傳統之重要見證」；第 (iv) 項為「可作為一種建築、建築群或地景的傑出範例，具體展現出人類歷史上一個或數個重要階段」；第 (v) 項為「可作為傳統的人類聚落、土地使用或海洋使用的傑出範例，以代表一種（至數種）文化或人類與環境互動的方式，特別是在其不可逆轉之變化的影響下變得易於損壞時更顯重要」(UNESCO 2012)。
12. 舉例來說，本研究田野期間，即觀察到包含聯合國的志工團隊赴伊富高協助文化遺產範圍內道路的維修、日本金澤大學提供經費聘用伊富高人士做為駐地研究人員參與其里山倡議相關研究、日本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會聯盟協助編撰伊富高傳統農業知識教材（參見陳堯 2015）、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考古夏日學校（參見官大偉 2016）與 SITMo 合作將考古成果轉化成在地文資中心展示內容等國際合作活動。
13. 在 2016 年至 2018 間，本研究曾經踏查的田野地點 *Asipulo*，仍傳出新人民軍叛亂、政府軍撤離居民的訊息。
14. 在本研究的田野，曾經參與兩次伊富高省政府與各市聯合舉辦的科地雷拉日紀念活動（實地踏查編號 17、實地踏查編號 23）。相對於左派非政府組織舉辦的紀念活動，官方的活動較少強調開發衝突、資源掠奪和暗殺事件，而著重於強調伊富高自治的推動。
15. 深度訪談編號 03。
16. 焦點團體座談編號 01。
17. 焦點團體座談編號 04。
18. 深度訪談編號 06。
19. 深度訪談編號 08。
20. 這些國際資金並不會進入到個別的 NGO，但 ICHO 有一個由 NGO 組成的委員會（包含 SITMo 亦是委員會成員之一）參與討論並給意見回饋。焦點團體座談編號 09。
21. 但若進一步細分則還有更多的品系。根據國際稻米研究中心 (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 IRRI) 的研究，在科地雷拉地區至少有 565 種已知的稻米品系，當中除了 5 種以外，其餘的都是在地原生種，因此將此地的水稻梯田視為傳統稻米品系在地保存的基因庫 (in situ gene bank) (Nozawa et al. 2008: 73)。

22. 此機構為 1950 年代由洛克菲勒基金會與福特基金會所創辦的組織，總部設立於菲律賓，其早期的組織目標是推動綠色革命，以新品種取代舊品種，以化學農業肥料及機械器具，形成密集農業，提高產量產值 (Stone and Glove 2016)。
23. 深度訪談編號 06。
24. 實地踏查編號 10、實地踏查編號 19。
25. 實地踏查編號 05、實地踏查編號 08。
26. 深度訪談編號 14。
27. 深度訪談編號 15、16、17。
28. 例如，在本研究 2019 年的田野過程中觀察到，經歷了 2019 年 5 月菲律賓期中選舉之後，伊富高的省長、市長有了新任的人選，而政府和非政府組織之間也開始有新的磨合，地方亦必須修復因為選舉時支持對象的不同而產生的緊張關係。
29. 深度訪談編號 11。
30. 深度訪談編號 09。
31. 深度訪談編號 06。
32. 這樣的概念，和洛克的財產權理論（也就是認為經由勞動與土地永久的結合、永久的改造了土地，付出勞動的主體才能主張對土地的產權）相結合，就推演出「原住民的游獵採集並未永久改造土地，仍保持土地原貌，因此無資格主張對於土地之權利」的論點，而成為了殖民者正當化其掠奪原住民族土地之行為的理由之一。

引用文獻

- 王鑫 [Wang, S.] 2014。造園、景觀與地景—國土規劃中適用那個名詞？[Zao yuan jing guan yu di jing —Guo tu gui hua zhong shi yong na ge ming ci; Which term should we use for planning?]. 造園季刊 [Zao yuan ji ka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82: 70-1。
- 官大偉 [Guan, D. W.] 2016。伊富高踏查專刊導言 [Yi fu gao ta cha zhuan kan dao yan]。人類學視界 [Ren lei xue shi jie; AnthroVisions] 19: 42-3。
- 李光中 [Lee, K. C.] 2010。地景、社區與生物多樣性保育 [Di jing she qu yu sheng wu duo yang xing bao yu]。林業研究專訊 [Lin ye yan jiu zhuan xun; Forestry Research Newsletter] 17 (1): 19-22, doi: 10.29953/FRN.201002.0005。
- .2014。社區參與世界遺產經營：國際相關政策的緣起與演進 [She qu can yu shi jie yi chan jing ying: Guo ji xiang guan zheng ce de yuan qi yu yan jin;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world heritage management: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the relevant international policies]。文化資產保存學刊 [Wen hua zi chan bao cun xue kan; Journal of Cultural Property Conservation] 29: 45-54。
- 李光中、王鑫、蔡嘉玲 [Li, K. C., S. Wang, and C. L. Tsai.] 2012。邁向協同治理？權益關係人參與自然地景保育的機會和限制 [Mai xiang xie tong zhi li? Quan yi guan xi ren can yu zi ran di jing bao yu de ji hui he xian zhi; Towards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for stakeholder

- participation in natural landscape conservation of Taiwan]。地理學報 [Di li xue bao;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65: 27-52, doi: 10.6161/jgs.2012.65.02。
- 李秀琴 [Li, X. Q.] 1994。有關台灣原住民、西洋宗教體系與傳教士的德文文獻 [You guan Taiwan yuan zhu min xi yang zong jiao ti xi yu chuan jiao shi de de wen wen xian]。臺灣史研究 [Taiwan shi yan jiu;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1(2): 131-40, doi: 10.6354/THR.199412.0131。
- 李孟儒 [Li, M. R.] 2016。SITMo 於伊富高梯田保育運動中所實踐之策略及其扮演的角色 [SITMo yu yi fu gao ti tian bao yu yun dong zhong suo shi jian zhi ce lue ji qi ban yan de jue se]。人類學視界 [Ren lei xue shi jie; AuthroVisions] 19: 54-5。
- 吳幸玲 [Wu, H. L.] 2008。全球城市消費性奇觀的文化生產—上海的住宅景觀 [Quan qiu cheng shi xiao fei xing qi guan de wen hua sheng chan—Shang hai de zhu zhai jing guan; Cultural production of consumerist landscapes in global cities a case study of housing landscapes in Shanghai]。地理學報 [Di li xue bao;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52: 31- 52, doi: 10.6161/jgs.2008.52.02。
- 徐苡庭 [Xu, Y. T.] 2016。殖民情境下的族群建構、考古學與當代原住民—從菲律賓伊富高考古學詮釋爭議談起 [Zhi min qing jing xia de zu qun jian gou kao gu xue yu dang dai yuan zhu min—Cong fei lu bin yi fu gao kao gu xue quan shi zheng yi tan qi]。人類學視界 [Ren lei xue shi jie; AuthroVisions] 19: 46-47。
- 陳巧筠 [Chen, Q. Y.] 2016。伊富高的農業生活與變遷 [Yi fu gao de nong ye sheng huo yu bian qian]。人類學視界 [Ren lei xue shi jie; AuthroVisions] 19: 48-9。
- 陳宗仁 [Chen, Z. R.] 2012。菲律賓原住民的臺灣經驗 [Fei lu bin yuan zhu min de Taiwan jing yan]。原住民族文獻 [Yuan zhu min zu wen xian] 6: 13-5。
- 陳堯 [Chen, Y.] 2015。菲律賓伊富高省文化傳承與培育原住民知識專家計畫淺談 [Fei lu bin yi fu gao sheng wen hua chuan cheng yu pei yu yuan zhu min zhi shi zhuan jia ji hua qian tan]。原教界 [Yuan jiao jie] 66: 82-3。
- 康旻杰 [Kang, M. J.] 2017。地景敘事的詮釋與建構—臺北社子島文化地景的實驗性敘事操作 [Di jing xu shi de quan shi yu jian gou—Tai bei she zi dao wen hua di jing di shi yan xing xu shi cao zuo; Interpretations and constructions of landscape narratives: The experimental narrative operation for the cultural landscapes of Taipei's Shezi Island]。地理學報 [Di li xue bao;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86: 49-69, doi: 10.6161/jgs.2017.86.04。
- 張碧君 [Chang, P. C.] 2013。古蹟地景、國族認同、全球化：以新加坡中國城為例 [Gu ji di jing guo zu ren tong quan qiu hua: yi xin jia po zhong guo cheng wei li; Heritage landscape, nation-building, globalization-Taking Singapore's Chinatown as an example]。地理學報 [Di li xue bao;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71: 29-47, doi: 10.6161/jgs.2013.71.02。
- 楊弘任 [Yang, H. R.] 2011。何謂在地性？從地方知識與在地範疇出發 [He wei zai di xing? Cong di fang zhi shi yu zai di fan chou chu fa; What is loc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cal knowledge and indigenous category]。思與言 [Si yu yan; Thought and Words] 49 (4): 5-29, doi: 10.6431/TWJHSS.201112.0010。

- 盧道杰、吳雯菁、裴家騏、台邦·撒沙勒 [Lu, D. J., W. C. Wu, K. J. C. Pei, and S. Taiban] 2006。建構社區保育、原住民狩獵與野生動物經營管理間的連結 [Jian gou she qu bao yu yuan zhu min shou lie yu ye sheng dong wu jing ying guan li jian de lian jie; Establishment of the links among community-based conservation, indigenous hunting and wildlife management]。地理學報 [Di li xue bao;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46: 1-30。
- 謝國斌 [Xie, G. B.] 2016。菲律賓的族群圖像與政策 [Fei lü bin de zu qun tu xiang yu zheng ce; Multicultural politics of the Philippines]。台灣國際研究季刊 [Taiwan guo ji yan jiu ji kan; *Taiw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2 (4): 55-79。
- 賴奕諭 [Lai, Y. Y.] 2017。做為一個不斷抵抗的原住民：擺盪在治理與抗爭之間的菲律賓難題 [Zuo wei yi ge bu duan di kang de yuan zhu min: Bai dang zai zhi li yu kang zheng zhi jian de fei lü bin nan ti]。民族學研究所資料彙編 [Min zu xue yan jiu suo zi liao hui bian] 25: 99-145。
- 臧振華 [Zang, Z. H.] 2003。華南、台灣與東南亞的史前文化關係：生態區位、文化互動與歷史過程 [Hua nan Taiwan yu dong nan ya de shi qian wen hua guan xi: Sheng tai qu wei wen hua hu dong yu li shi guo cheng]。發表於「新世紀的考古學－文化、區位、生態的多元互動」學術研討會，臺北 [Fa biao yu xin shi ji de kao gu xue wen hua qu wei sheng tai de duo yuan hu dong xue shu yan tao hui, Taipei]。
- Acabado, S. 2010. *The archaeology of the Ifugao agricultural terraces: Antiquity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Hawaii, Honolulu.
- . 2012. The Ifugao agricultural landscapes: Complementary systems and the intensification debate.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43 (3): 500-22, doi: 10.1017/S0022463412000367.
- . 2013. Defining Ifugao social organization: “House,” field, and self-organizing principles in the Northern Philippines. *Asian Perspectives* 52 (2): 161-89, doi: 10.1353/asi.2013.0009.
- Acabado, S., J. M. Koller, C. H. Liu, A. J. Lauer, A. Farahani, G. Barretto-Tesoro, M. C. Reyes, J. A. Martin, and J. A. Peterson. 2019. The short history of the Ifugao rice terraces: A local response to the Spanish Conquest. *Journal of Field Archaeology* (44): 195-214, doi: 10.1080/00934690.2019.1574159.
- Acabado, S., and M. Martin. 2015. Between pragmatism and cultural context: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Ifugao wet-rice agriculture. In *Water and heritage: Material, conceptual and spiritual connections*, eds. W. Willems, and H. van Schaik, 275-97. Leiden: Sidestone Press Academic.
- Ananayo, J., and H. Richins. 2016. Regional collaboration in community-based mountain tourism in world heritage sites: The Ifugao rice terraces of the Cordillera Central Mountains in the Philippines. In *Mountain tourism: Experiences, communities, environments and sustainable futures*, eds. H. Richins, and J. S. Hull, 220-34. Wallingford: CABI.
- Anda, M. 2010 *Kapaligirang Pilipino*. Manila: LG&M Corporation.
- Ashmore, W., and A. B. Knapp. 1999. *Archaeologies of landscape: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xford: Blackwell.
- Barton, R. F. 1919. Ifugao law.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cations in American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15 (1): 1-120.

———. 1922. Ifugao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cations in American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15 (5): 385-446.

Beyer, H. O. 1926. Recent discoveries in Philippine archaeology. Paper presented at Third Pan-Pacific Science Congress, Tokyo.

———. 1947. Outline review of Philippine archaeology by islands and provinces. *Philippine Journal of Science* 77: 205-374.

———. 1955. The origins and history of the Philippine rice terrac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Eight Pacific Science Congress, Quezon City.

Büscher B., and W. Dressler. 2012. Commodity conservation: The restructuring of community conservation in South Africa and the Philippines. *Geoforum* 43: 367-76.

CIA. 2020. *Philippines*.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resources/the-world-factbook/geos/rp.html> (last accessed 7 March 2020).

Clawson, D. L. 1985. Harvest security and intraspecific diversity in traditional tropical agriculture. *Economic Botany* 39 (1): 56-67, doi: 10.1007/BF02861175.

Cosgrove, D. 2003. Landscape: Ecology and semiosis. In *Landscape interfaces: Cultural heritage in changing landscapes*, eds. H. Palang, and G. Fry, 15-21. Dordrecht: Kluwer.

Conklin, H. C. 1967. Some aspects of ethnographic research in Ifugao. *Transaction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30 (1): 99-121, doi: 10.1111/j.2164-0947.1967.tb02455.x.

———. 1980 *Ethnographic Atlas of Ifugao: A study of the environment, culture, and society in Northern Luz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Cox, K. R. 1998. Spaces of dependence, spaces of engagement and the politics of scale, or: Looking for local politics. *Political Geography* 17: 1-24, doi: 10.1016/S0962-6298(97)00048-6.

Cresswell, T. 2004. *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Delaney, D., and H. Leitner. 1997. The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scale. *Political Geography* 16: 93-7, doi: 10.1016/S0962-6298(96)00045-5.

Dulawan, L. 2001. *Ifugao: Culture and history*. Manila: National Commission on Culture and the Arts.

Duncan, J., and N. Duncan. 1988. Rereading the landscap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6: 117-26, doi: 10.1068/d060117.

Fagan, R. 1997. Local food/global food: Globalization and local restructuring. In *Geographies of economies*, eds. R. Lee, and J. Wills, 197-208. London: Arnold.

Farina A. 2000. The cultural landscape as a model for the integration of ecology and economics. *BioScience* 50: 313-20, doi: 10.1641/0006-3568(2000)050[0313:TCLAAM]2.3.CO;2.

Feld, S. 1996. Waterfalls of son: An acoustemology of place resounding in Bosavi, Papua New Guinea. In *Sense of place*, eds. S. Feld, and K. H. Basso, 91-135. Santa Fe NM: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 Fletcher, R. 2010. Neoliberal environmentality: Towards a poststructuralist political ecology of the conservation debate. *Conservation and Society* (8) 3: 171-81, doi: 10.4103/0972-4923.73806.
- Forman, R. T. T. 1995a. *Land mosaics: The ecology of landscapes and region*.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1995b. Some general principles of landscape. *Landscape Ecology* 10: 133-42, doi: 10.1007/BF00133027.
- Forman, R. T. T., and S. K. Collinge, 1997. Nature conserved in changing landscapes with and without spatial planning.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37: 129-35, doi: 10.1016/S0169-2046(96)00378-7.
- Forman, R. T. T., and A. M. Hersperger. 1996. Road ecology and road density in different landscapes, with international planning and mitigation solutions. In *Trends in addressing transportation related wildlife mortality*, eds. G. L. Evink et al., 1-22. Tallahassee: Florida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 Gera, W. 2015. The politics of ethnic representation in Philippine bureaucracy.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39 (5): 858-77, doi: 10.1080/01419870.2015.1080374.
- Gisselman, F., S. Cole, J. Blanck, M. Kniivilä, N. S. Hansen, and E. Fornbacke. 2017. *Economic values from the natur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Nordic countries: Improving visibility and integrating natural and cultural resource values in Nordic countries*. Copenhagen: Nordic Council of Ministers, doi: 10.6027/TN2017-522.
- Guimbatan, R., and T. Baguilat. 2006. Misunderstanding the notion of conservation in the Philippine rice terraces – Cultural landscapes.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58: 59-67, doi: 10.1111/j.1468-2451.2006.00606.x.
- Glover, D., and G. D. Stone. 2017. Heirloom rice in Ifugao: An 'anti-commodity' in the process of commodification.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45: 776-804, doi: 10.1080/03066150.2017.1284062.
- Harvey, D. 1996.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Malden, MA: Blackwell.
- Howitt, R. 2003. Scale. In *A companion to political geography*, eds. J. Agnew, K. Mitchell, and G. Toal, 138-57. Oxford: Blackwell.
- Hoelscher, S. 2006. Heritage. In *A companion to museum studies*, ed. S. Macdonald, 198-218. Malden, MA: Blackwell, doi: 10.1002/9780470996836.ch13.
- Johnson, N. 1995. Cast in stone: Monuments, geography, and nationalism.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31: 51-65.
- Kirshenblatt-Gimblett, B. 1998. *Destination culture: Tourism, museums, heritag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ambrecht, F. 1929. Ifugaw villages and houses. *Publications of the Catholic Anthropological Conference* 1 (3): 117-41.
- . 1962. Religion of the Ifugao. *The Philippine Sociological Review* 10 (1-2): 33- 40.
- . 1967. The hudhud of dinulawan and bugan at Gonhadan. *Saint Louis Quarterly* 5: 527-71.
- Macnaghten, P., and J. Urry. 1998. *Contested natures*. London: Sage.

- Mark, D. M., A. G. Turk, N. Burenhult, and D. Stea. 2011. *Landscape in language: Tran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1-24.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McFarland, C. D. 2009. Linguistic diversity and English in the Philippines. In *Philippine English: Linguistic and literary perspectives*, eds. M. A. Lourdes, S. Bautista, and K. Bolton, 131-56.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McGuirk, P. 1997. Multi-scaled interpretations of urban change: The federal, the state and the local in Adelaide's Western Area Strateg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15: 481-98, doi: 10.1068/d150481.
- Meinig, D. W. 1979. Introduction.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ordinary landscapes- Geographic essays*, ed. D. W. Meinig, 1-1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ozawa, C., M. Malingan, A. Plantilla, and J.-E. Ong. 2008. Evolving culture, evolving landscapes: The Phillippine rice terraces. In *Protected landscapes and agrobiodiversity values*, eds. T. Amend, J. Brown, A. Kothari, A. Phillips, and S. Stolton, 71-93. Gland: IUCN.
- Ngohayon, S. L., M. L. Delson-Fang-asan, and L. D. Dulawan. 2015. *Guardians of the forest, stewards of the land: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practices of the cordilleras*. Manila: Cover and Pages Publishing Inc.
- Rama, M, D. C. Domingo, J. G. Rama, and J. A. Cruz. 2006 *Pilipinas: Isang sulyap at pagyakap*. Makati City: Edcrisch International, Inc.
- SITMo. 2008. *IMPACT: The effects of tourism on culture and the environment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Sustainable tourism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Site of the Ifugao Rice Terraces*. Philippines, Bangkok: UNESCO Bangkok.
- Scott, J. C. 2009.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New Haven, CT, USA: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cott, W. 1974. *The discovery of the Igorots*. Quezon City, Philippines: New Day Publishers.
- Sheppard, P., S. Aswani, R. Walter, and T. Nagaoka. 2002. Cultural sediment: The nature of a cultural landscape in Roviana Lagoon. In *Pacific landscape: Archaeological approaches*, eds. T. Ladefoged, and M. Graves. 35-61. Los Osos: Easter Island Foundation.
- Stone, G. D., and D. Glover. 2016. Disembedding grain: Golden rice, the green revolution, and heirloom seeds in the Philippines. *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 online first*: 1-16. doi:10.1007/s10460-016-9696-1.
- Taylor, P. J. 1982. A materialist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geography.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7 (1): 15-34.
- . 1993. *Political geography: World-economy, nation-state, and locality*. 3rd ed. Harlow: Longman.
- Thomas, J. 2012. Archaeologies of place and landscape. In *Archaeological theory today*, ed. I. Hodder, 167-87. Polity: Cambridge, doi: 10.3390/land4030888.
- Tilliger B, B. Rodríguez-Labajos, J. V. Bustamante, J. Settele. 2015. Disentangling values in the interrelations between 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s and landscape conservation – A case study of the Ifugao Rice Terraces in the Philippines. *Land* 4: 888-913.
- Tuan, Y. F. 1974.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UNESCO 2012. *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 Paris: World Heritage Centre.

Walter, R. K., and R. J. Hamilton. 2014. A cultural landscape approach to community-based conservation in Solomon Islands. *Ecology and Society* 19 (4): 41-50, doi: 10.5751/ES-06646-190441.

Zukin, S. 1993. *Landscapes of power: From detroit to Disney World*. New York, NY: Wiley.

2019年10月29日 收稿

2020年3月21日 修正

2020年3月23日 接受

附 錄

附錄表 1 本研究之實地踏查說明

編號	時間	地點	踏查主題
01	2015.07.20	Kiangan	Ifugao 博物館及周邊戰爭紀念神社
02	2015.07.21	Kiangan	Nagacadan 梯田 Open Air Museum
03	2015.07.22	Banaue	Hapao 梯田、Beyer 博物館、Banaue 在地文化的展示園區
04	2015.07.24	Kiangan	有機農園
05	2015.07.24	Kiangan	當地表演團體 Kiangan Culture and Arts Council and Ifugao Performing Arts Group 在市府前展演
06	2015.07.25	Kiangan	當地市集
07	2016.07.16	Kiangan	Nagacadan 梯田
08	2016.07.16	Kiangan	Kiangan Culture and Arts Council and Ifugao Performing Arts Group 與民答那峨團體交流
09	2016.07.18	Sagada	蘇馬晶洞穴 (Sumaging Cave)、懸棺 (Hanging coffins) 地點踏查
10	2016.07.19	Asipulo	梯田及稻米收穫祭典
11	2016.07.20	Kiangan	林下咖啡農園
12	2016.07.20	Kiangan	IAP (伊富高考古計畫) 社區發表會
13	2016.07.22	Hungduan	梯田
14	2016.07.22	Banaue	梯田與觀光市集
15	2016.07.23	Kiangan	Ifugao 博物館及梯田 Open Air Museum
16	2016.07.26	Kiangan	社區感恩收穫祭 Boklay
17	2018.07.14	Kiangan	IPED Center 織品工作坊、Cordillera Day 官方慶祝活動—傳統織品展與服裝秀
18	2018.07.15	Kiangan	ifugao 博物館之收藏品與紀錄
19	2018.07.16	Asipulo	梯田及稻米收穫祭典
20	2018.07.18	Banaue	梯田
21	2018.07.19	Kiangan	梯田 Open Air Museum
22	2019.07.13	Kiangan	Ifugao 博物館之收藏品與紀錄
23	2019.07.13	Lagawe	Cordillera Day 官方慶祝活動--Unity Gong 儀式
24	2019.07.14	Mayoyao	梯田
25	2019.07.15	Hungduan	梯田
26	2019.07.15	Hungduan	家屋
27	2019.07.15	Banaue	Beyer 博物館
28	2019.07.16	Banaue	社會企業 ekoLIFE

附錄表 2 本研究之焦點團體座談說明

標號	時間	地點	座談主旨	參與者背景
01	2015.07.20	Kiangán , SITMo 辦公室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伊富高梯田農業系統、文化背景，以及社區合作之經驗。 2. IAP (Ifugao Archaeological Project) 所進行的研究和成果。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SITMO 成員 2. IAP 成員
02	2015.07.23	Nagacadan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伊富高當地的農業與歲時祭儀、伊富高的水資源管理、伊富高人的親屬稱謂與社會組織。 2. SITMo 的國際串連事務與社區合作案例。 3. 伊富高梯田文化的當代教育傳承議題。 	Nagacadan 農民
03	2015.07.24	Kiangán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SITMo 在伊富高地區所進行的調查成果。 2. SITMo 傳承在地知識所編纂的教材。 3. IAP 處理考古遺物的程序，以及和馬尼拉博物館、伊富高博物館、伊富高在地社區的合作。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SITMO 成員 2. IAP 成員
04	2016.07.16	Kiangán , SITMo 辦公室	IAP 最新的運作狀況，以及停止考古挖掘後之工作目標，包括轉化考古成果作為社區發展資源。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SITMO 成員 2. IAP 成員 3. 村民代表
05	2016.07.17	Sagada (Mountain Province) , MRDC 辦公室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MRDC (Montañosa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 此一非政府組織之成立背景、目的及主要從事工作。 2. Sagada 當地的歷史背景，社區內傳統文化與外來宗教的磨合，MRDC 組織工作者的生命經驗。 3. MRDC 和伊富高省之非政府組織的合作關係。 	MRDC 組織代表
06	2016.07.21	Tinoc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伊富高現有的土地法律及和在地習慣法之間的關係。 2. Tinoc 的土地使用及農地轉作情況。 3. Tinoc 申請及成功獲得傳統領域 (Ancestral Domain) 證書的過程。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Tinoc 市政府官員及村長 2. 在地農民代表

附錄表 2 續

標號	時間	地點	座談主旨	參與者背景
07	2018.07.17	Kiangan, IPED Center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伊富高梯田、編織文化的保存復育行動，文化傳承面臨到青少年的認同問題與挑戰。 2. IPED (Indigenous Peoples Education) Center 成立的背景、目的及主要從事工作。 3. 伊富高大學 GIAHS (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 中心成立的背景、目的及主要從事工作。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IPED Center 成員 2. 伊富高大學 GIAHS 中心主任及成員
08	2019.07.17	Lamut, 伊富高大學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金澤大學里山計畫和伊富高社區的合作模式與成果 2. GIAHS 計畫執行的成果 3. 社區耆老對在地知識傳承的經驗與看法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金澤大學里山計畫主持人及成員 2. 伊富高大學 GIAHS 中心主任及成員 3. 社區耆老
09	2019.10.11	Lamut, 伊富高大學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伊富高文化資產辦公室之功能 2. 原住民知識教育教材發展的經驗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伊富高文化資產辦公室主任及成員 2. Gohang 中學原住民知識教育教師

附錄表 3 本研究之深度訪談說明

編號	時間	地點	受訪者	性別	年齡	受訪者背景
01	2015.07.22	Hapao	E.L.	女	50	伊富高省原住民委員會 (NCIP) 主任
02	2015.07.25	Kiangan	M. B.	女	81	Kiangan 社區之重文化傳承者，曾為國小老師，現為梯田導遊與 SITMo 志工
03	2016.07.18	Kiangan	S.A.	男	43	UCLA 人類學系教授，菲律賓人
04	2016.07.20	Kiangan	R.	男	40	農夫
05	2016.07.20	Kiangan	R.	男	41	農業改良場主人
06	2016.07.22	Hungduan	M.M.	男	43	SITMo 執行長
07	2016.07.23	Kiangan	E. D.	女	65	伊富高出身之政治人物，擔任過 NCIP 的族群委員和主委，並且參與菲律賓原住民族權利法案 (IPRA) 的推動和草擬過程
08	2018.04.27	電話訪問	M.M.	男	43	SITMo 執行長
09	2018.07.14	Kiangan	B.S.	女	50	Kiangan 市長秘書
10	2018.07.15	Kiangan	B.G.	女	30	SITMo 志工
11	2018.07.15	Nagacadan	O.H.	男	30	Kiangan 舞蹈協會主席，SITMo 志工
12	2018.07.17	Kiangan	M.	女	63	IPED 織布工作坊織者
13	2018.07.17	Kiangan	E.C.	女	72	IPED 織布工作坊織者
14	2018.07.17	Kiangan	M.B.	女	81	Kiangan 社區之重要文化傳承者，曾為國小老師，現為梯田導遊與 SITMo 志工
15	2018.07.19	Kiangan	J.N.	女	34	IPED 織布工作坊織者
16	2018.07.19	Kiangan	L.G.	女	82	IPED 織布工作坊織者
17	2018.07.19	Kiangan	E.A.	女	40	IPED 織布工作坊織者